

邵 阳 文 史

第 27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邵 阳 文 史

第 27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主 编 王梅初
副 主 编 谢道锡
编 辑 刘 瓚 苏缙如
书名题字 魏恒斌
封面设计 谢道锡

邵 阳 文 史

第 27 辑

政协邵阳市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

湖南省邵阳市印刷厂印刷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 - 1500

湘邵新出准字(1999)第 19 号

目 录

人物春秋

我的父亲贺绿汀·····	贺逸秋	(1)
与贺老一次难忘的见面·····	孙纯贵	(3)
拜访贺绿汀先生·····	龚伟	(6)
难忘恩师贺绿汀·····	舒平	(8)
陈新宪与邵阳民盟·····	容众	(13)
缅怀恩师陈新宪·····	蒋业儒	(19)
缅怀陈新宪同志·····	石安邵	(24)
魏肇文先生传略·····	马少侨	(28)
黄呈祥事略·····	黄叙伦	(31)
缅怀唐生智校长·····	萧新业	(35)
曾光炎先生传略·····	马少侨	(42)
怀念母校——双江中学与校长杨澄清·····	谭松山	(47)
忆地下交通联络员赵赐章·····	田夫 粟文	(49)
主任医师王重甦生平述略·····	苏缙如	(53)
我在六师的班主任马少侨老师·····	易重廉	(61)
教育老人刘星堂·····	苏缙如	(69)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曾谷荪·····	浚渠	(84)
热心为老年人服务的唐景中·····	伍东白	(98)
孙小武与无籽西瓜·····	谢光维	(104)
奉献尽在不言中·····	叶飘 杨扬	(116)

目 录

人物春秋

我的父亲贺绿汀·····	贺逸秋	(1)
与贺老一次难忘的见面·····	孙纯贵	(3)
拜访贺绿汀先生·····	龚伟	(6)
难忘恩师贺绿汀·····	舒平	(8)
陈新宪与邵阳民盟·····	容众	(13)
缅怀恩师陈新宪·····	蒋业儒	(19)
缅怀陈新宪同志·····	石安邵	(24)
魏肇文先生传略·····	马少侨	(28)
黄呈祥事略·····	黄叙伦	(31)
缅怀唐生智校长·····	萧新业	(35)
曾光炎先生传略·····	马少侨	(42)
怀念母校——双江中学与校长杨澄清·····	谭松山	(47)
忆地下交通联络员赵赐章·····	田夫 粟文	(49)
主任医师王重甦生平述略·····	苏缙如	(53)
我在六师的班主任马少侨老师·····	易重廉	(61)
教育老人刘星堂·····	苏缙如	(69)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曾谷荪·····	浚渠	(84)
热心为老年人服务的唐景中·····	伍东白	(98)
孙小武与无籽西瓜·····	谢光维	(104)
奉献尽在不言中·····	叶飘 杨扬	(116)

邓亚萍故里行	萧祥海	(119)
李晴云诗赠筱玉梅	马少侨	(131)

往事钩沉

情系湘中忆华年	曾立勋	(136)
解放初期的回忆	郑治凡	(144)
回忆反右	李薰山	(147)
走出阴霾	李鸿宣	(154)
忆农村公共食堂	刘岭岚	(160)
大跃进中学校师生大搞劳动杂忆	李仲平	(163)
五十年来的邵阳工会工作	孙纯贵	(171)

工商经济

邵阳市冶金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赵振荣	邓伯群	(179)
忆全国地方高炉会议在邵阳召开的盛况	朱 诚		(185)
邵阳市市区个体手工业改造始末	陶合林		(191)
忆过“苦日子”时的邵阳市针织厂	陶合林		(201)
建立洞口县第一个国营工厂的回顾	邓 华		(204)
解放前的邵阳挤兑潮	王振奇		(211)
邵阳民间借贷	卿彦思		(214)
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财产重估	郑治凡		(225)

铁路交通

- 邵阳铁路规划建设 40 年 李 严 (228)

历史遗迹考证

- 魏源沙洲故宅沿革补证 刘伟顺 (245)
蔡锷出生地考 雷连生 (251)
烟村“岳武穆祠”的变迁 岳未乡 李方源 (253)
龙山罗汉寺与古岳观 黄叙伦 (259)
邵阳市佛教四大丛林 王振奇 (263)
宝庆府城街巷布局及名称演变 刘伟顺 (267)
丰庆门与北正街 朱智方 (275)

旅美杂记

- 旅美见闻录 刘揆民 (281)
纽约纪行 许超凡 (289)

我的父亲——贺绿汀

贺逸秋

父亲今年已经 96 岁了，来访者看到他行走自如，谈吐思路清晰而活跃，常说：“贺老不老”。但 96 岁的人还能不老吗？正像音乐界的一位朋友说的，他的高寿不但在我国音乐界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乐坛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他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他还有信心要作跨世纪的老人。

因为比别人多活了些年头，经历的事也比别人多。他在 1926 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参加了广州起义，可说是我国音乐界参加革命最早的人。三十年代初，钢琴传来我国不久，在被“舶来品”垄断的钢琴乐坛，他的一首《牧童短笛》荣获了《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比赛的头奖，吹来了一股清新的“中国风”，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在有声电影传入中国不久，他又活跃在左翼电影界，在短短的四年中为 17 部电影作曲配乐，其中《都市风光》是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也是我国影片由现成的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第一部影片。在此期间创作了《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仍为群众所喜爱。1936 年出版了他翻译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将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引进中国的译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一曲《游击队歌》唱遍了全国各个抗日战场，鼓舞了无数青年奔赴抗日前线。1946 年他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管

弦乐团(现中央交响乐团前身),任第一任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直到现在还是该院的名誉院长,大概也是世界上任期最长的音乐学府领导人了;他将毕身的精力倾注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在上海音乐学院创建了民族音乐系,使中国的民族音乐第一次在高等音乐学府占有一席之地。首创了大、中、小配套成龙,专业、业余相互衔接,兼顾提高与普及,多渠道办学的,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有不少人在国际比赛上获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79年9月,在父亲率领下,中国音乐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音乐理事会,在会上我国被接纳为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1983年父亲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家。

父亲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次的“第一”,作为女儿,我们希望他成为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位百岁老人。希望他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不平后,能轻松愉快地安度晚年。但他现在仍然好象很忙,每天报刊、书籍不离手,吃饭时喊他几遍还舍不得放下。他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文艺界,特别是音乐界的发展,关心上海音乐学院的有关事情。而对家事却很少过问,只有看到咿呀学语的重外孙时笑得那样甜,还诙谐地说他是个“怪人”。他的心永远是那样童真而透明,我想这也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是他生命交响曲的重要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父亲于1999年4月27日20时15分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96岁。

与贺老一次难忘的见面

孙纯贵

姨父贺绿汀偕夫人姜瑞芝 1980 年 4 月第四次回到家乡，从邵阳返回长沙准备回上海的前夕，于 1980 年 4 月 23 日上午在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梁志仁（贺老的姨甥）家，并通知我也去见面（当时我正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学习）。

下面是我和姨父贺绿汀、姨母姜瑞芝谈话片断的回忆，并以此文怀念二老。

已多年不见，一进门很亲热，握手。

贺老：你头发也开始白了，快 50 了吧！

孙：是的，今年正 50 岁，“文化革命”把人都搞老了，不如 1965 年前，那时才 30 多岁。

贺：是呀！

姜：还把人搞死了哩！

孙：真是一场灾难，多少老将老师受害。

姜：我家也被搞死了一个（指二女儿贺晓秋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现在好啦！你二老身体还不错，四姨比那几年还健壮了，真是满面春风（大家笑）。

贺：你在党校学习，读什么书呀！解决什么问题？

孙：解放思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学习辩证法，讨论真理标准……。

贺：我看我们邵阳还有些人思想不那么解放，如某某的事，你要回去反映反映，我已与朱东阳讲了（朱东阳系原中共

邵阳市委书记)。

姜:过去株连不少人,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一个人死了还要受牵连,要轮到那一代啊!你家里还好吗?

孙:还好,儿女三个都出去了,老大读医科大学,老二、老三也当了工人,还读电大。

姜:小虹(指当时也在座的我大儿子孙虹)不错,下乡三年又考上大学,将来当医生分到上海就好(孙虹插话:给四姨当保健医生),那就太好了。

孙:我是1964年、1965年两次出差到上海您家,1969年“文革”高潮时我在一个化工厂当厂长又出差到上海,住在一个旅社,但当晚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开辆小车,把我抓到学院审问,一直关到天亮,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趁没人在时,我才跑了出来。

贺:还有这个事!真是胡闹。

姜:那时候你来我家也见不到我们,他们是被放了暗哨的,不然哪有那么快!

姜:我们老了,回来一次算一次了,你们要多多照顾好你妈妈(指我岳母姜洁人,系姜瑞芝亲妹妹)。

这时梁志仁同志在喊吃饭了,要早点休息,明天好走。吃饭时,大家为他二老敬菜,贺老还在不停地问话。他说:“大鸡大肉都不要,只想吃点邵阳的杂菜、豆鼓、磨芋豆腐、蕨粑粉,还喜欢吃鳊鱼头。还有邵阳的桔子,本来好吃,但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带酸,不如过去的‘大红袍’好吃了。”

孙插话:一是收摘太早了,二是否与施农药、化肥有关,但有的改良品种还好。

贺老还风趣地指着舌头说:舌头是肠胃的侦察兵,只要它

感觉好就行。

饭后,贺老又给朱东阳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回邵阳。在信的结尾,特写上“专此敬礼!!!”打了三个惊叹号。我问他为什么打三个,他微笑说,这你还不懂,这表示三鞠躬,是最高礼节了!我说,我平常一般不写,或写也只写一个。贺老告诫说,那要因人而定了。

注:贺绿汀同志于1999年4月27日20时15分去世,享年96岁。

贺老夫人姜瑞芝同志于1997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90岁。

拜访贺绿汀先生

龚 伟

在一个“春天里，百花开”的日子，96岁高龄的人民音乐家贺绿汀阖上了那双总是闪烁着旋律的眼睛。

贺老走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之情，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1989年5月，我带着如何改革中小学音乐教学的一些问题，与市教研室王轶伦等同志，专程去拜访贺绿汀先生。贺老一听是家乡人来了，又是搞教育工作的，他破例接待了，非常热情。

贺老询问了学校音乐教学情况以及家乡风物人情。我们一一汇报后，贺老特别强调：音乐是进行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小学音乐教学要认真抓一抓，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关注：

一是专业教师少。尤其是农村学校，音乐课是搭头，教师大多是兼职，无责任感。一节课唱两遍歌算了事，这怎么行呢？地方师范专科学校要开设音乐专业，培养一批专业教师；教育学院、进修学校要举办培训班，提高教师素质，以解燃眉之急。

二是课堂教学糟。一些社会上不适合学生特点的流行歌曲，格调不高的歌曲，甚至还有思想不健康的黄色歌曲进入了课堂，连幼儿园里的娃娃也跟着唱，校长们、教师们熟视无睹，真不像话！我们要大声呼吁：不能再让那些肮脏的东西去毒害幼小的心灵！

三是教学方法差。据反映,现在中小学音乐教学,没有层次性,一法到头,一唱到底,不搞声乐基础练习,单调刻板。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听觉的艺术,离开听,音乐艺术怎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可不可以搞点教改实验,把好方法推开去。‘如何改,你们有实践经验。我老了,耳有毛病,深居书斋,信息不灵,但对下一代的成长,时记心上,拜托各级教育基层领导,高度重视音乐教学。

箴言教化施时雨,懿德薰陶启后生。贺老短短几十分钟的谈话,我们受益匪浅。临别时,贺老高兴地和我们合影留念。一帧珍贵的留影,一席谆谆教诲,时时在鼓舞和鞭策着我们。

难忘恩师贺绿汀

舒 平

1956年~1961年,我有幸在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领导的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在这五年及毕业后的三、四十年间,有不少往事使我终身难忘。

与洛宾兄弟

1961年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去新疆,结识西部歌王王洛宾,并和他同在新疆军区歌舞团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上海音乐学院去的学生,就对我说:“你们贺绿汀院长写《游击队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他写完《游击队歌》的第二天,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之后,在闲聊中经常谈起三十年代抗战时他和贺绿汀同在丁玲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工作的许多往事。王洛宾是男高音歌唱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时,声乐老师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妹妹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是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王洛宾在抗日演剧队主要是搞演唱,也开始从事作曲。来演剧队之前,他已为肖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里的《奴隶的爱》谱过曲。但对作曲,毕竟刚开始。他说在抗敌演剧队能有机会和贺绿汀在一起工作,是极难得

※作者系福建民族音乐编委会记者,国家二级作曲。

的机会。贺绿汀比王洛宾大10岁,而且是著名音乐家黄自的高足,国立上海音专毕业生,是一位已经作过许多电影音乐的作曲家。在作曲方面,王洛宾十分仰慕贺绿汀的才华和赞赏他的作品。他们相处得像亲兄弟。这段时日,对王洛宾的作曲生涯,起了极深远的影响。王洛宾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如《老乡,上战场》、《风凌渡的歌声》、《大家要心齐》、《血花曲》、《洗衣歌》等许多歌曲的创作,都得到贺绿汀的帮助。他对贺绿汀老大哥一直怀着感激之情。直到王洛宾和作家肖军、诗人塞克结伴西行要去新疆,才与贺绿汀分手。

在他们分开将近半个世纪的1993年11月,王洛宾来上海音乐学院讲学,在贺绿汀老院长家中相逢时那种激动之情,着实令人感慨万千。这些事虽已成为历史,但是,在本世纪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两位音乐大师之间的交往,是值得记载的,是值得纪念的。

爱学生感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因在路线斗争中“觉悟低”、“站错队”,被勒令离开部队,返回“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闽南老家。组织上确定必须到工厂“接受工人再教育”,说我是“中国音乐界修正主义祖师爷贺绿汀的孝子贤孙,若让他再搞音乐工作,会继续毒害青少年,因此不准再搞音乐。”

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叫我归队到剧团工作。本想这一下可好了,可以干老本行了。没想到到了剧团,经党支部研究,叫我搞财务工作。当时派党支部组织委员和我谈话,叫我当出纳。我说:“‘四人帮’倒了,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拨乱反

正,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要求专业对口,继续搞音乐工作。”这位“聪明的”组织委员这样开导我:“音乐的1、2、3、4、5、6、7是数字,财务记账也是数字。你以后见到数字不要当作音符弹在键盘上,而把它看作账目的数字打在算盘上,怎么能说是‘专业不对口’呢?”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大权他们在握,咱们为老百姓,唯有服从的份。但实在气不过,才给文化部去信反映。后来文化部将信函转来本地宣传部,宣传部长把我叫了去,狠狠训斥一顿,说我竟敢状告他的下属,说我不自爱。从此,处处给我穿小鞋。真是“踩上一双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打入冷宫。剧团组织工作队下乡搞中心工作5次(如计划生育、社会调查……),每次都叫我去,并假惺惺地说“舒平是参加过土改的干部,农村工作有经验。”剧团出国访问10次,每次都留着看家,不让我去。实在无路可走,才给心中最尊敬的贺绿汀老院长去了信诉诉苦,心想老院长在文革中吃过大亏,定更能体贴下属、学生的苦衷。老院长看了我的信很气愤,对我一位同学讲:“竟有如此对待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的?!浪费人才嘛!”当时我并没有请求贺院长帮助我做什么。他老人家又是给福建省委写信反映,又是直接给泉州某单位来信,要求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使学生十分感动。

贺院长向福建省委负责同志去信反映。福建省人事局给贺院长回信如此写道:“贺老院长,舒平同志给您的信由张淦民同志批转给我‘中心’调查处理。我们正在了解并与有关单位联系推荐,尽快给舒平同志调整到专业对口岗位上工作。特信告。”没多久,贺院长又亲笔写信给泉州市有关同志说:“舒平同志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毕业生,系从部队复员